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中港矛盾的表象與結構：回應〈香港，誰的香港？〉

Manifestations and Structures of China-Hong Kong Conflicts: A Response to "Hong Kong, whose Hong Kong?"

doi:10.6752/JCS.201609_(23).0011

文化研究, (23), 2016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3), 2016

作者/Author：王智明(Chih-ming Wang);陳欣欣(Angelina Chin)

頁數/Page：201-20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6/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9_\(23\).0011](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9_(23).001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中港矛盾的表象與結構：回應〈香港，誰的香港？〉

Manifestations and Structures of China-Hong Kong Conflicts:

A Response to “Hong Kong, whose Hong Kong?”

王智明、陳欣欣¹

Chih-ming Wang、Angelina Chin

今天，討論香港問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較於九七回歸前後，文化論述對於香港身分的追索，在懷舊與嘆息中仍帶著一絲期待，今天——特別是在雨傘運動之後——關於香港問題的討論，已不再有懷舊的距離；在政治、文化、經濟與生活的全面擠壓下，中港矛盾已成為思考香港問題的主軸，其展現的方式也就更為劇烈，乃至暴力相向。從「蝗蟲論」之類的言語暴力，在街上驅趕陸客，到雨傘與水槍、塑膠子彈的對峙，乃至於銅鑼灣書店老闆及創辦人林榮基的無故失蹤，和他對於北京和香港政府的控訴所表現出來的，不只是本土意識對陸客的排拒，更是香港人對北京暴力壓制的批判與反抗。當壓制與反抗成為香港問題的主旋律時，香港華人的身分認同以及香港是否為中國的一個城市，這樣的問題自然變得高度政治化，本來對於港人而言毫無疑問的基本認識，因而在中港關係中變得敏感，脆弱而易爆。

童慶生的〈香港，誰的香港？〉正是在這麼一個情緒高度緊繃、問題極度複雜的脈絡中書寫的。相較於本專題的其他文章，童文的質問與討論具有高度的針對性與立即性，直指香港問題的表象與結構，尤其是貫穿其中的「文化」作用。童文一開始就以官恩娜的例子指向了香港社會的「軟暴力」，點出了中港矛盾的兩個核心表徵：種族主義式的歧視言論以及殖民主義的陰影。前者以蝗蟲論為代表，後者較為複雜：一方面是殖民制度與意識的延續，另

1 王智明，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

陳欣欣，美國波莫納學院副教授

電子信箱：wchimin@hotmail.com; angelina_chin@pomona.edu

一方面是中港資本主義的交織，既有港資進軍內地炒房的問題，也有陸資與陸客對香港的衝擊。作者認為，這些表面上的矛盾肇因於「大陸改革開放後帶來的諸多問題，但歸根結底，還是文化上的抗拒」，具體展現為對「『大陸化』的拒絕」(192-193)以及對殖民主義的懷念(193)。這就回到了殖民意識與種族主義的潛意識同構的問題上。簡單說，童文的基本看法是：中港矛盾的核心是殖民主義陰魂不散，因此「香港問題遠不局限於政治或意識形態，更多的是文化和生活習慣上的區別」，因為真正主導中港矛盾的力量，與其說是一國兩制，還不如說是國際資本；因為國際資本同時改變了香港和大陸，在經濟融合的過程中引發了文化上的衝突，這使得香港人「自己覺得擁有了香港，才可以不必考慮大陸的感受，才可以毫無顧忌地叫大陸人滾回去」(198)。

童文的主張突出了兩個值得思索的問題：一是如何回應「誰的香港？」這個充滿情緒張力與政治暗喻的問題，才不會落入情感與政治的博奕？二是主導中港矛盾的核心力量究竟是什麼？我們的討論將沿著這兩個問題展開，目的不在於批駁童文的觀點（但這不表示我們認同他的觀點，只是覺得可以藉著他的設問打開更大的討論空間），而在於從表象進入到對於中港矛盾結構的思考，亦即追問造成中港文化差異的政治與歷史結構是什麼？尤其，我們希望在思索中港矛盾之餘，也將討論轉向關於治理、霸權與正義等問題，因為這些不只是香港的問題，也是大陸與臺灣的共同關切。

一、「誰的香港？」

童文的設問來自於一種經驗性的矛盾：一方面是言論暴力對居港陸胞造成了情感傷害，而有了孔慶東之流的網民化言論；另一方面「一國兩制」不只設定了國家主權的統一，還包括了身分、思想和認同的統一，即令中港「制度」不同。因此，「誰的香港？」不只是在主觀感受上的質問，它同時涉及香港主權、治權以及一國兩制設置的關鍵性問題。也就是說，從本土主義的角度觀之，香港當然屬於香港居民，但九七之後，不論是毒奶粉事件、雙非生子、大量陸客來港、還是爭取普選失利，再再讓香港人民感到香港不屬於自己。九七前後，香港人民之所以支持一國兩制，正是因為「兩制」的安排，承諾確保香港的生活與制度不受改變。然而，普選權利屢爭不得恰恰突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僅是口號；近年北京緊縮香港言論自由的空間，更使得「五十年不

變」的承諾蒙上陰影。

但是從大陸同胞的角度來看，令他們不解的是，明明是已經「收回」的殖民地，香港人為什麼仍和九七之前一樣，對他們採取一種「高等華人」的態度，甚至將赴港或居港陸胞視為異類般的他者？為什麼明明是一國，香港人卻可以生活在不同的制度裡，享受特權，乃至於童文所說的「弱小的霸權」（198）？難道香港不是中國的？難道香港人不是中國人？香港人是不是被「慣壞了」？姑且不論這樣的評論是否帶著父權家長制的威權性格，認為香港得寸進尺，甚至忘宗背祖，但這類「不愉快的國際經驗」，確實是「當中國開始深入世界」後常感到的挫折。

的確，在回歸後的香港、在「中國人的土地」上，遭遇這樣的經驗，尤其難受。但是這樣的情感交鋒，或許突顯的更是中港之間的互不理解，尤其是缺乏了對九七以後兩邊變化的動態認識，例如2003年開放陸客自由行後對香港生活與經濟的衝擊，以及「愛國」如何成為區分敵我、打壓異己的工具。這是童文強調「文化」差異的出發點，卻也是他被文化差異所遮蔽的盲點。

不過，更值得關注的是，如此的文化差異折射了本土香港、英殖香港和中國香港這一歷史過程所呈現出的糾結與掙扎，不只表現於語言上的暴力相向以及情感上的距離，也展現於「文明」想像、「本土」想像和「主權」想像幾個疊合卻不相容的結構裡。姑且不論香港人對大陸同胞的歧視性語言是否構成「種族歧視」，殖民歷史與國族歷史所形構的情感差距與文明期待，確實加深了中港矛盾，而使得「歧視」成為壓制與反抗的象徵。北京壓制香港民主的力道愈強，香港認同所具有的反抗性與吸引力愈大，「軟暴力」於是成為「硬暴力」的理由，從言論檢查、集會管制到體制性的壓迫（例如2014年人大常委反對香港普選的決議）不一而足，乃至激發出更激烈的對抗手段。只著重中港矛盾的「文化差異」（歧視和戀殖），而不討論這個差異如何被結構性地生產出來，是我們覺得童文可惜的地方。

不過，童文的大陸觀點也突顯了一個具體的事實，即香港原是一個移民社會，許多的「香港人」不都是不同時期從大陸來的移民嗎？那麼，為什麼九七後的大陸移民卻被排拒在「香港人」的身分之外？難道他們的聲音和記憶不算數？為什麼香港不能接納他們的差異，一如中國接納了香港？這樣的提問自然也不只是主觀感受的問題，而必須回到香港身分的歷史性構造中去回答。如羅永生的分析，「香港『回歸』中國顯然是一個被動的過程，遠

多於發自一個全面的『回歸運動』」，其後果便是由「回歸」所遮蔽的「解殖」議題至今仍然縈繞不去，而激發出一系列遲來的「本土運動」；同時，「被動回歸」亦引發了「回歸」並未完成的認識，而產生「文化回歸」的需要，乃至於將國民教育強加於香港人的嘗試。換句話說，作為與中國認同相對抗的本土香港身分，其實來自於九七回歸這個未完成的去殖民工程：一國兩制非但保留了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活，也確保香港身分在這樣的制度與生活中，與大陸保持距離。香港不是不能接納大陸，而是在這個接納與統合的過程中，他們早已被設定為例外，一如殖民時期一樣，在九七之後，繼續活在「借來的時間」裡，甚至是「借來的土地」上。無法認同香港本土主義中的「軟暴力」誠然可以理解和尊重，但不去理解形成這股暴力的結構和原因，而將其傷害歸諸於歧視和戀殖，甚或訴諸於暴力與脅迫，其效果與西方的反恐戰爭無異，都是緣木求魚。對我們來說，童文的價值也正在這裡。如果說語言暴力是中港矛盾最重要的象徵，那麼殖民主義的完而未了，就是更值得我們探究與分析的結構。這也是我們第二個提問的關鍵所在。

二、中港矛盾的核心力量

童文的第二小節主要將中港矛盾的問題放在全球資本的脈絡中來理解，因此有了九七前後中資與港資在土地與消費問題上的種種矛盾。更精確地說，作者的思考似乎是：全球資本在中港兩地所造成的不均衡地理發展，並以文明差異與種族主義的形式出現。香港認同的深化，一方面緣於這樣的經濟整合過程，使得香港成為具有優勢的一方，而逐步發展成為一種分離或獨立的意識。另一方面，九七回歸後在中港經貿實力交替、角色轉換之下，香港人被剝奪感增加，從而強化了對本土與自我的認同。換句話說，香港認同的問題，與殖民資本主義在九七前後的發展密切相關。今天的中港矛盾正是源於政權轉移與一國兩制，非但沒能夠啟動去殖民過程以解決殖民問題，反而因為經濟分配不均以及政治權力管控失當，而被轉化為文化衝突以及認同矛盾。對照太陽花運動後的臺灣，兩岸矛盾也有類似的結構。

然而，童文雖然點到了殖民主義的問題，但其思考並沒有深究九七回歸後，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共謀關係。如果說，九七前的港資北進可以被視為一種「北向殖民主義」的話，那麼九七後中資入港是否也可以被理解為

「南進殖民主義」？進而言之，當香港資本（如李嘉誠）和媒體（如明報）爲了保護自身利益，而順應北京的政治立場來壓制本土文化精神和民主自治權利的時候，我們究竟該將此壓迫歸諸於國際資本，還是逐步緊縮的一國兩制以及受其庇蔭的權貴資本？在一國兩制的結構中以及愛國忠誠要求下（即當「一國」更重於「兩制」的時候），香港資本、媒體、知識分子，乃至於藝人，是否還有獨立於政治的條件與空間？他們感受到的壓迫、挫折與無奈，究竟是國際資本，還是一國兩制的過錯？同樣地，「反國教運動」的發展不也是因爲政治對文化權利的壓制所造成的反抗，而使得香港形成了「依戀英殖反抗中殖」的奇特現象？這難道也是國際資本造成的後果？將香港的戀殖歸罪於港人，而不考慮北京在治理與制度上的差異如何破壞了既有運行良好的制度——而且是承諾不予改變的制度——難道不會倒果爲因嗎？

事實上，中港矛盾中更爲核心的問題是，到底如何經驗性與理論性地看待回歸後的香港？一國兩制究竟是多元一體的中國爲了逐步統合的權宜之計，還是沿用殖民主義而實行的間接統治？若是前者，其統合的進程不能不注重差異性的結構性生成，而將香港視爲內部，並且鼓勵在地的民主參與；若是後者，香港則無異於一塊例外之地，可以作爲中國面向世界的看板和窗口，乃至於權貴洗錢的天堂，但注定無法擁有自主自治的權力。九七後，香港主權回歸中國，但是香港的殖民體制，包括童文提到的學院機構，都在「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下保留了下來。但在治理上，回歸後，香港民主參與的空間並沒有增加，反而如同殖民時期一樣被壓抑，甚至是減少了；雖然「馬照跑、舞照跳」，港督成了特首，但是一般香港人在政治、文化與經濟上仍處於從屬地位。由此觀之，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接近羅永生所描述的「勾結共謀的殖民主義」；香港回歸不過是殖民權力的本地化，民主治理的欲望與權力仍然被否認；香港不是香港人的，而是中國的。

從這個角度思考，「誰的香港？」這個問題便產生了新的意思。如果說，對童文而言，這是居港陸胞對於香港本土主義的質疑，那麼它同樣也可以是香港民衆對於港府和北京當局的質問；如果前者針對的是「軟暴力」及其相應的身分意識，那麼後者指向的就是治理上的「硬暴力」以及對自治權力的要求，是對殖民體制的批判及其終結的期待。

放諸兩岸與中國邊境上種種關於認同與歧視的爭執，我們不難發現，認同與歧視不過是暴力的表象，真正關鍵的是建構認同與歧視的結構性力量。

面對香港的未來，我們似乎看不到樂觀的條件，但也沒有悲觀的權利。所謂中港矛盾，解決的方法或許不在於期待香港認同瓦解，或是加強對反中歧視的批判，而在於如何從治理的層次上鬆動愛國愛黨的民族主義緊箍咒，從實施全面普選制開始，打造一個民主的、參與式的，而不是排除性的政治結構，落實與保障「港人治港」民主自治的期待。事實上，在〈香港基本法〉中就列明，香港會以循序漸進原則實現普選。然而這樣一點點的理想就在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決議中被粉碎。同年發生的雨傘運動，就是一場爭取真普選的大型公民抗命運動。可惜雨傘運動只能喚醒新一代民衆對民主的追求，卻未能扭轉中共的決定。雨傘運動之後，民主運動出現了和平抗爭與勇武本土主義的兩極化，讓民主進程變得更為艱鉅。也有人認為，這是百花齊放的跡象，代表香港政治論述變得更為多元，有更多的可能性。香港到底會如何走下去，現在還是未知之數。可以肯定的是，香港的未來，不僅香港人關心，深受國際資本影響的臺灣與世界也同樣關心著。這也是我們對童文的期待。